

● 经济改革启示录

“忧患足以兴邦”。改革方能强国。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巨大变化，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没有优越性。但它确实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体制缺乏生命力，它窒息了竞争和创新，劣化了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益下降，日益明显地束缚了生产力的

● 樊 纲 著

渐进之路

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发展。当前中国的抉择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坚持既定的改革之路，增强综合国力，以便在世界激烈的经济竞赛中立足于不败之地。路身于强国之林。本书针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难点和热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大胆进行探究，给人以启示，力图探索在稳定中实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召唤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体制。



渐进之路

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2 020 0601 5

责任编辑：芜 铭

责任校对：吴 戈

封面设计：朱 虹

版式设计：芜 铭

渐进之路

——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Jianjin zi Lu

樊 纲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大厂县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 6 印张 114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ISBN 7-5004-1224-X / F · 236 定价：3.90 元

总 序

戴国晨 华 飞

GUC 68/14

春风吹拂，枝头又绿。1992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若干重大决策，激励人们高扬起改革开放的风帆，破浪前进，驶向胜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得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把经济一步一步搞上去，在讲求效益的基础上，加快赶超的速度。

多少年来，我们总有一些同志爱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持着穷革命、穷光荣的观念不放，还是摆不脱当年盛行过的“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的阴影，对于生产力标准，总觉得不够革命、不够踏实。其实，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百余年来中国志士仁人之为奋斗的，就是要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富强繁荣

的新中国，使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和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这才是搞社会主义。一些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局顷刻发生巨变，有的一下子就垮了，其原因固然非只一端，但说到底，根本原因还是经济没有搞好，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不出来，老百姓不满意。中国之所以能够“风景这边独好”，则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牛鼻子不放，经济繁荣，市场活跃，人民得到了较多的实惠。两相对比，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还排得很后，经济发展的现状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差得很远。我们还得循着“忧患足以兴邦”的思路，增强忧患意识，扭住经济建设中心不放松，夹着尾巴向前跑，跑得比现在再快一点。

要跑得再快一点，就得改革开放。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的各种变化，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乏生命力，但它确实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体制缺乏生命力。它束缚了人们的手脚，窒息了竞争和创新，劣化了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益下降。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不改革或者只作一些枝枝节节修修补补式的改革，难以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必然会在经济发展的竞赛中使人们感到失望，以致引发出人们看到的巨变。必由之路正意味着，不改革没有出路，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解放

生产力，才能使社会主义更加巩固和健康地发展。这就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正在做着的事情。

历史还启示我们，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传统体制不会轻易地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新体制的推进会遇到许多障碍和困难。这不仅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观念不更新很难正确评价和判断是非；而且体制的变动涉及到权力调整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动真格的便会使改革流于形式，动真格的则会因权力和利益的冲突而造成许多磕磕碰碰。所以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革命，那是一种只会葬送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加左派幼稚病的结果；而改革则确确实实是一场革命——它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前提，因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体制改革，因而能够避免对抗性冲突式的革命所可能造成的混乱与破坏，实现在稳定中推进革命，在稳定中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在稳定中建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使经济体制反映的各种经济关系得到合理调整。

历史还启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这表现在，国民经济本身是一个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各个子系统内部又是一个包括许多分支系统的网络。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各个经济细胞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中，形成了相互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传统经济体制中盘根错节的制度体系。因而，在改

革初期推出某几项单项改革，可以见到效益、扫到浮财，而当体制改革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要继续深化，便得把改革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对待，使改革配套协调，避免整个系统的剧烈摩擦。传统体制的整个体系，像连环套那样一环套一环地缠结着，不可能靠单项改革的突破和撞击反射来改变整个体系。所以，在大步推进改革时，也要像解开九连环那样，对庞大的经济系统的配套改革，有序地作出安排。

历史还启示我们，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同时，又正是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上述三个转换互为牵扯、互相影响，也需要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协调。我国传统的数量型、外延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作为一种启动经济发展的战略，确实推动建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数量型、外延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有不断的大量的投入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会形成投入不断增多而产出相对下降的趋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供给虽有增长，但投入增长幅度大于产出增长幅度，从而形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封闭循环，使得总需求膨胀成为传统发展战略难以摆脱的伴生物，也使得“软预算约束”和“投资饥渴症”成为传统经济体制的顽症。因此，发展战略亟待转换。而发展战略转换需要与经济体制转换相协调。协调了则彼此促进，不协调则彼此掣肘

牵扯。还要看到，我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等，都处于转换变化的过程之中。然而，每一种经济结构的形成都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它决不是哪个个人的主观意志可以随意左右的，但同时它又不是纯粹自然选择的结果。它是由多种力量相互交织而产生的合力推动其形成和演变的。从我国近年来的状况看，经济调整追求的目标，原本是使结构优化，但由于传统经济体制中缺乏促使存量调整的机制，扭曲的价格形成的利益导向，不仅没有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反而仍然制造着失衡；不允许失业的政策前提，也使得产业结构存量调整机制无从建立。这样，供给结构因体制制约而处于超稳固状态，与收入增长形成的消费结构变量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城市住房等项消费还是福利型的，又使得需求领域相对狭隘。从上面所举的事例来看，体制的变革将会引起供给、需求等方面经济结构的变革；经济体制转换和经济结构转换如何方能协调推进，也需要在深层次研究解决。

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当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形成之后，一方面在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加速工业化方面显示了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令人为难的商品短缺与商品积压并存、效率普遍不高等问题。当时，有人想借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波兰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则提出了有名的模拟市场的“试错法”，即由计划机关制定价格，如果不能

使供需协调，可以采取“错了再试”的办法，使之逐步逼近由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从而保留“价格的参数作用”。这使得奥斯卡·兰格成了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改革而自我完善的思想家。如今，我们迈出的步子已经比兰格的设想超出了许多，已经从“模拟市场”转向了建立实实在在的市场，开展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系统改革。然而，从改革的进程来说，虽然当理性思维已清楚地意识到了某些方面的明显缺陷，但在试图改变它时，却往往会遇到主观意志和自然选择多种变量相结合时的判断困难，以致有时仍不得不用“试错法”来证明我们每一项具体决策的正确与否。我们曾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经过 1988 年以来的曲折历程，我们更加感到，当改革的春风再次吹绿大地的时候，有必要回过头来审视已走过的改革历程，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并使之上升到理性思维的高度，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理出一条线索，以摆脱那种依赖“试错法”走走看看的近乎于原始的改革方法。

上述设想，几年前早已有之。起初只是面对着深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与困难，想对所处困境作一综合性研究。然而，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愈加感到，改革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于是，我们开始把眼界放到了对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所需要的条件及其可能产生影响的诸多“热点问题”上，并特别对问题的结节点进行了专题性分

析。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们抓紧了这套《经济改革启示录》丛书的写作和修改，形成了目前的格局。

《经济改革启示录》丛书是由经济学专家写给非专家读者看的书，经济专业的读者也会从中获得新的感受和新的启示。

参与这套书撰稿的，有久享盛名的经济学家，但其主力则是一群具有良好经济理论修养的青年经济学博士。在经济学界前辈的参与和指导下，他们欣然命笔，努力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所创新，有所发现，有所建树。

《经济改革启示录》丛书具有与以往经济学著作不同的鲜明特色：其一，它具有鲜明的理性思维的特点，即在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时，努力站在哲学思维的高度上，强化经济研究的哲学意识，努力开创经济哲学之先河。其二，它具有基本统一的学术倾向和写作风格。在丛书成书的过程中，曾几经讨论和协调，统一思想，努力使丛书成为首尾一贯的理论体系，因此它决不是临时拼凑的拼盘式的应时之作，而是在一个理性目标模式之下反复琢磨的理论精品，并具有明显的建设性特点。其三，它具有大众读物的特点，是大众化的社会科学通俗书籍。参与本丛书写作的作者，并非都是语言学专家，也并非都受过通俗化、趣味化写作的严格训练，但他们确在这方面尽了力。每本书各章的提要，也是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情趣而特地编写的。

我们希望这些努力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编写《经济改革启示录》丛书，旨在为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献计献策。对丛书编委会来说，这是一项新的事业。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将不断选择一些经济热点和难点，分期分批地组织选题，不断地奉献给读者。我们殷切希望热心读者读了这套丛书后提出宝贵意见，以帮助和推动丛书编委会更好地组织编好这套书。

1992年3月于北京

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经济分析

0.1 经济改革与经济分析

本书直接的也是基本的目的，既不是建立改革的目标模式，也不是提供改革战略或改革“对策”，而是要对改革过程本身，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作一些系统的理论分析。

经济学所分析的对象，是人、人们或一个社会中的各种集团、阶层以及社会整体的经济行为，也就是人们通过某种方式、利用某种手段来增进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在本书中，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社会过程，也视为一种经济行为、经济运动来加以考察。这样做所暗含的假定是：人们力求通过体制改革来增进自身的经济利益。

经济改革这一经济行为或经济过程，与其他种种经济行为如生产、交换、投资、消费等等一样，也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有“投入”，有“产出”，有“成本”，有“收益”，有“需求”，有“供给”。也就是说，与其他种种经济活动有着一些共同的属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运

用一般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对其加以分析，形成关于“经济改革的经济理论”。

不过，需要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体制改革过程本身还具有一些其他经济活动，特别是私人经济活动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这就是：它具有更强和更加直接的社会性。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本身，是一种用社会契约或法律形式（在没有正式法律的地方，可能存在着“规章”或“条例”）规定下来的协调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它不是仅适用于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而是适用于一切人、一切集团的，因此，对一种制度的改革，绝不会像一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家庭种地吃饭那样仅涉及一个小的经济单位的经济利益，或者像一个企业主雇用一个人那样仅涉及两个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是要涉及许多人的利益，涉及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关系。因此，它要复杂得多。也正因如此，我们仅运用一般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不足的，还要运用一些更为复杂的经济学概念和经济学理论方法，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及“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等等。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分析，仍将严格地限于“经济分析”；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也都限于现代经济学的范围之内。

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通常所说的“体制改革过程”。但是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的“体制”一词，具有一般的意义。实

际上相当于现代经济学上所说的“制度”或“制度安排”，泛指协调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经济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无论是人们在各种场合或某些具体问题上所使用的“制度”、“体制”、“机制”等概念，在本书中都可用“体制”一词来加以概括。有的时候，在分析过程中，为了与有关的经济理论所惯用的术语保持一致，我们可能不用“体制”一词，而直接用“制度”或“机制”等。总之在本书中，我们一般不必计较“体制”、“制度”、“机制”等概念之间的差别，在多数情况下，只需注意到它们的共同内涵或它们内涵的共同部分，即协调人们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它们可以指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结构，大到所有制、宏观管理机制、价格机制，小到生产车间、班组建制、家庭；也可指各种各样成文的行为规范（“不成文”的行为规范的问题我们后面还要专门加以说明），如法律、规章、“条例”，等等。

在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上，当人们从某些特定的角度去分析经济过程或经济行为的时候，也许区分“制度”、“体制”、“机制”等概念是重要的^①，特别是在对制度结构本身的研究，以及对改革的“体制

^①这方面的定义和区分可以有許多，对“制度”或“体制”、“机制”概念的理解也往往因研究对象、学科范围和具体问题而有所不同；日常用语和理论概念也会存在着差别，这里不一一列举。笔者自己也曾在对公有制经济的分析中，针对所要分析的特殊问题，对制度、体制和机制作过区分。见樊纲（主笔）、张曙光等著：《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版，第67—69页。

目标模式”的研究中，更是重要的，当我们研究改革过程的“先后秩序”问题时，也是重要的，但在本书的许多场合，我们所强调的只是“改革过程”的一般性质，即从一种组织结构过渡到另一种组织结构，以一种行为规范转换到另一种行为规范。

0.2 经济问题与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针对一定的经济问题而提出的。一个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快是慢，生产活动是否有效率，资源配置是否合理，社会经济运动是否稳定，等等，都是经济学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在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在经济问题的形成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起着怎样的作用。

首先要明确的是，在经济过程中或经济问题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是经济制度。概括地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实绩和现存的各种经济问题，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因素。

第一，由科学技术的性质所决定的物质生产力，即人类利用物质资源将其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有用物品的能力。一个社会所拥有的物质资源当然也属于生产力（“国力”）的范畴，但是，给定自然界的状态，究竟有多少自然物质能够被算作人的“生产资源”，进入人们能够利用的范围，则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一万年前的铁矿石被人们当作一般无用的砂石；一千年前谁也不会说“核能”是我们的生产资源；而再过一万年火星可能已被算作我

们的“资源存量”了；今天看来没用的荒山，明天可能就是宝贝。这里的道理就在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程度，决定着我们所拥有的生产资源的数量；一个国家的“资源丰富”与否，是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点来加以评判的。

第二，经济信息，包括各种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知识和对未来事变的预期。前面所说的科学技术也是人类的一种知识，但它主要指的是人类已经拥有的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而经济信息，指的主要是人们对于已有的科学知识的了解，对人们的消费需求偏好和行为方式的了解，包括对经济中的“盈利机会”、“市场结构”和交易伙伴“可信程度”等等情况的了解，还包括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未知事件的推测和对未来事变的预期与判断。掌握的信息量越少，信息传递速度越慢，越是无知，预测能力越差，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越大，经济效益就越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就越慢。

第三，就是本书所要着重分析的“经济体制”。广义地，经济体制包括一切与生产、交换和收入分配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比如，假如一项通常所说的政治体制也涉及到了国民收入在不同集团之间的分配，那么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我们也要将其作为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加以分析。对于诸如道德、价值标准、传统习惯、文化、意识形态等等通常所说的“非经济因素”也是这样，只要它们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便构成经济理论的分析对象，在经济理论中也被处理为“经济体制”或“经济

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下面要对这些作具体的说明）。

0.3 经济体制为什么重要？

经济问题和经济过程不是仅仅取决于经济制度，但我们这里要特别强调经济制度所起的作用。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比如马克思），经济发展的快与慢，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速度，最根本地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取决于现存经济体制是束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生产力进步这个问题上，经济体制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比如对“经济效率低下”这个经常困扰我们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可称为“技术官僚”（Technocrats）的管理者，仍然认为我们的国营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水平低。但是，技术水平低、装备差，只是解释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因素，但却不能解释大量存在着的资源浪费、设备闲置、质量达不到标准^①，生产者不努力劳动等等造成低效率的现象。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有了新技术可以束之高阁，二十年不用；新进口的高精尖设备买来了可以放在露天日晒雨淋直到报废。从发展的角度看，有了一个能激励人们不

^①技术水平低自然不能造出更高质量的产品，但一定的技术总还能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我们企业中的各种“质量标准”，正是按照我们已经掌握的技术来制定的（而不是按照世界上已达到的最高技术水平制定的）。因此，若质量低于这一标准，显然就不能用技术水平低来解释，而只能由其他原因来解释了。